



##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瑞士)布伦诺·弗雷、阿洛伊·斯塔特勒著  
静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

消息。这一传、有分教:幸福这块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竟渐渐沦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乃至鱼目混珠之行屡现其中的鸡肋之地。

恰值哲学王国内部莫衷一是之际,弗雷(Bruno S. Frey)和斯塔特勒(Alois Stutzer)这支经济学帝国的远征军,携着本学科的坚兵利炮从瑞士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直击希腊罗马哲学传统的腹地,欲与诸位前贤大哲会猎于幸福之域。

### 经济学的斩获

这是一支奇兵,经济学远征军特别是其中的实证经济学家们并不像道德哲学家那样关注“应然”,他们更关注的是“实然”。哲学家们也许会义正词严地提出劝告或者警告:人们,幸福与德行共同构成至善,不料尼采从后方传来上帝龙驭冥天的

“专横”的道德律令,他们颇有些像闲话家常,又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请问,您觉得什么是幸福?不知道呀,没关系,那么您觉得现在幸福吗?或者,您觉得什么时候更幸福一些?……”

是的,经济学家不关心也无意解答什么是幸福,但也同样不希望由道德哲学家越俎代庖。在他们看来,对幸福的认知和理解是每个体察生活、体察幸福的人自己的事。经济学的任务,是利用调查或实验(例如测定脑电波变动反映出来的人对幸福的生理反应)得出的人们关于幸福的数据,以及反映经济社会生活中其他因素的数据,来分析判断出幸福与收入、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失业、通货膨胀以及政治制度等各种关系,进而希冀得出一些可能增进幸福的办法。在这些方面,经济学帝国的军队颇有斩获。

### 得失寸心知

被要求在月收入一千元与月薪一万元之间做出何者更幸福的判断时,我们也许会觉得不言自明。但若赋予前者“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般的平静恬然之义,而将后者置于舟楫劳顿、冗务缠身之境,哪一个更好,可能就得费些思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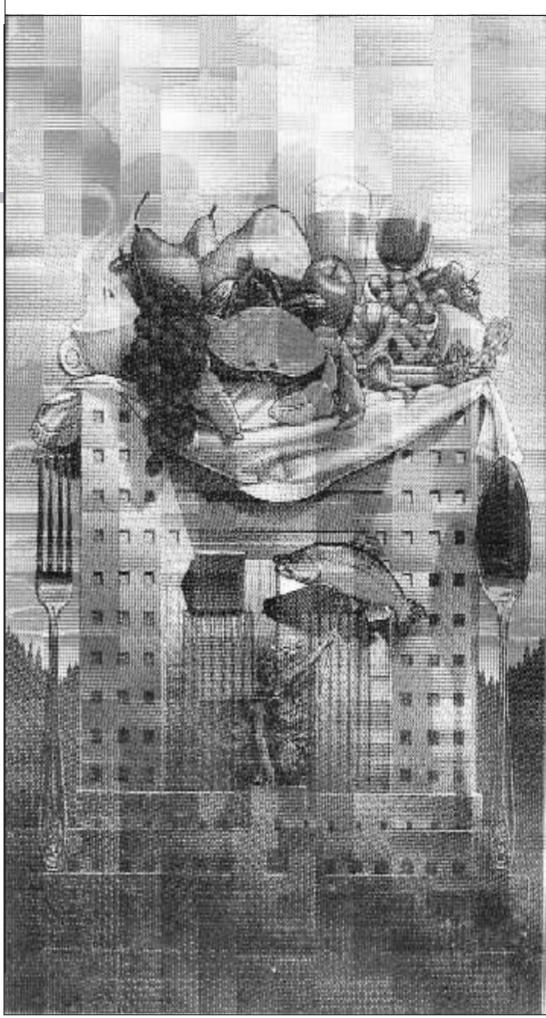
关于收入存量与幸福的关系,弗雷和斯塔特勒借用了有关统计图表来粗略说明。根据90年代各国生活满意度与生活水平关系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幸福程度大体相当且均位于较高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低的国家,有的幸福程度很高,有的则很低。这大致说明收入对于幸福,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穷人不能因收入而幸福,但并不妨碍他们因其他许许多多的理由而幸福。“幸福是有钱人的专利”之类的说法于此不攻自破。

再看动态化的财富增加与幸福。一个本来并不富裕的人,突然获得一笔财富,短期内他的幸福程度无疑会大幅提高。但一段时间之后,各种附着于这笔财富的烦恼纷至沓来,如影随形,同时他也适应了财富增加后的状态,原先的欣喜盎然远逝,福祉水平也会逐渐下降到稍高于获得财富之前的水平上。同理,一个人遽然陷入困顿之中,会痛苦万分,但随时间流逝,他多半会积极接受这种不幸,幸福水平也会向困顿之前的水平逼近。

可见,虽然增加穷人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他们的幸

# 幸福之妙存乎一心

读《幸福与经济学》



福水平,但从一般意义上看,不管是收入的存量还是收入的增量,都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用统计数据以貌似科学的面容系统地展现出来,却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所在。

### 增量与存量

幸福本身也有增量与存量之分。由特定时间内的特别事件带来的幸福增量是流量,而个人的稳定因素,如性格、健康状况、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带来的幸福是存量,幸福存量也可被视为过去时间里折现的幸福流量的总和。

作这样的区分之所以重要,在于人们可以据此主动地管理自己的幸福。存量中的一些要素是无法自我控制的,例如年龄和性别。好在研究表明,上了年纪未必就不幸,事实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要比中年人更幸福,而男女之间的幸福差距最近几十年中也日趋消失。但另外一些要素,例如受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控制。最顺理成章的方法就是用增量来调整存量。例如注意饮食改善身体状况,形成良好生活习惯,注意调节情绪,久而久之这些增量上的调整会积累起来成为幸福之存量的重要成分。再如,宗教能够带来更高的福祉感受,这个命题也得到了验证,尽管影响并不显著。对一些而言,对宗教的笃信和虔诚,也是用增量调整幸福存量的可采取措施之一。

### 重在参与权的政治

《道德经》有这么一句:是以圣

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常使民无知无欲。现在看来,这并非天下福祉所在。研究表明,参与政治过程对增进幸福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过程的有益结果对幸福的贡献。能保障公民在政治上更活跃的制度,更有助于公民的幸福。

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提出了“赞同先于正义”的原则,来强调一致同意和宪政的重要性;全体成员对于决定规则的规则,一定要在隔绝个人具体利益的“无知面纱”之下,达成一致同意。这样的“元规则”才能够保证其他由之派生出来的制度和它们规定下的行为的正当性。从幸福与政治参与的经验分析来看,布坎南的原则尚有重大改进余地。经验分析表明,参与权比实际参与对幸福的影响更大。也即,赞同与否的权力先于赞同本身。

可知,政治制度对于幸福的意义,是政治过程不亚于结果,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力优先于参与本身。

以思辨的深刻程度论,经济学帝国远征军对幸福的把握恐怕远不及哲学王国的精兵悍将,但也有其突出的优势。除嫡系部队之外,帝国还至少征调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王国的若干军队协同作战,以争夺幸福的制高点。故事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可以预见,在“幸福”这个古老但仍更令人振奋的领域,联军会演绎出更多故事,并取得更多胜利。倘不囿于门户之见,这些胜利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冯维江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至善”(supreme good),指出舍此之外,人类当别无所求。斯多葛认为德行即幸福,德之所在即福之所在;伊壁鸠鲁则反是,声称幸福即德行,促进自身幸福就是在体现德性。康德甚至“拔上帝以令诸侯”,认为存在着的上帝是幸福的“最后贷款人”,而幸福正是上帝存在所派生出来的恩泽,作为第二要素,幸福与德行共同构成至善,不料尼采从后方传来上帝龙驭冥天的

# 庙堂与江湖 谁化得了谁

评《江湖中国》

□陆震



《江湖中国》  
于阳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已被庙堂化得面目全非,哪有什么庙堂江湖化、社会化的事儿?

其实,于阳先生所多方揭出的庙堂系统、官方系统里那些不堪之事,其实与江湖无关或者很少与江湖有关,而主要与权力有关,与江湖对权力的监督有关。权力,犹如火与枪,无所谓好坏,就看它控制在谁手里。依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意思,权力,即使是无限的,如果掌握在上帝手里,什么事情也出不了,要是落在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人手里,那就危乎殆哉了。不幸的是,庙堂系统永远不会有上帝而只有人,这些人原本与天下苍生出于一脉,与天下的江湖众生同归一属,一与权力结合,只要到达一定的长度,都会演出人性阴暗面在权力纵容、推动、庇护下肆虐的闹剧、丑剧与悲剧,这里面根本没有江湖化、不江湖化的余地。如果江湖系统的人们对庙堂系统、庙堂系统的人们和庙堂系统人们手中的权力监督得比较好,上述毛病的发生时间可能推迟一些,发病的程度可能轻一些;但不论怎么监管,“病”必发无疑,区别只是早发还是晚发、大病还是小病、轻病还是重病而已。正因为此,限定制成了人类唯一的选择,即使是举世公认的好人,也不能无限期地当总统一、国家主席。

庙堂系统历来所见的无数坏事可归结为两个根本性的弊端:一个是坐天下之位,居天下之尊而不尊天下之公,不行天下之义,不守天下之规,不从天下之利,而为一己、一家、一群谋私利、小利;二是挟伐伐杀戮之威,以力治人,弱肉强食。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江湖系统安身立命的长项与强项。“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是江湖系统永恒的大旗,情理、情义则是江湖系统维系自身的道义源泉。这倒并非江湖本性高尚,而是它没有杀伐之权和杀伐之力。这一缺失,使江湖系统的劣化、腐败、衰退、堕落,乃是其内部自身之事,所以未来中国的有无希望,不在于超越江湖,不在于去江湖化,而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庙堂系统的认识与安排,取决于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分配、使用与监督。5000年华夏,从未存在过江湖中国而始终是庙堂中国,权力中国、集权中国、官本位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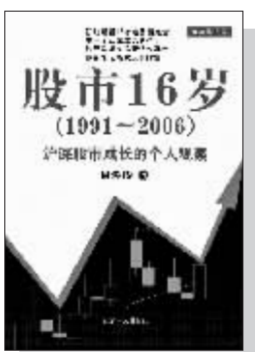
于阳先生所著《江湖中国》很耐读,有内涵,也挺有趣,且颇多灵气。书的主旨是探求“江湖”这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他的基本判断是,江湖不是好东西,而是5000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老年顽症、膏肓之疾。江湖的基因自古在于豪侠和商人之中,但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朝中期,其根本的起因是土地刚性而人口激增所带来的规模日趋扩展的流动人口;这一过程延续300年后,在19世纪初即乾隆退位后,因人口爆炸而质变,江湖社会崛起和爆发,最后,清末民国之交,江湖彻底颠覆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主导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过程。结论是,“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这些见解,于阳先生言之有据,一气呵成,启发人们思考良多。

笔者的专业是哲学与社会学,与“江湖”相涉较多,曾经对此有所思考。读过《江湖中国》,想就此说点不同看法。

江湖这个东西确实浆糊,它可大可小,不易论定。笔者多年琢磨之下,较为倾向于范仲淹老先生“登岳阳楼记”中“庙堂”和“江湖”的划分。只是想加上一笔,使其更清晰一些;即凡吃“皇粮”的由政府出钱养着的都属于庙堂,在此之外的都属于江湖。衣食之源的不同,是庙堂系统与江湖系统最本质的区别。只要这种局面不变,庙堂总是庙堂,江湖总是江湖,两者之间谁也化不了谁的。

物质生存方式之外,在精神和与精神相应的行为方面,庙堂系统与江湖系统之间确实不像在“食”问题上那样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渗透、影响与互动,但要说是谁化了谁,怕也难。庙堂系统内的人们,干什么、不干什么,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需要别人,需要江湖系统里的人去教吗?才不呢!他们本来就会,而且会得很专业,很内行。庙堂系统的内里、内幕、内底,内中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其情状远非江湖系统人们所能想象!在这里,压根儿不存在庙堂系统被江湖化的问题。相反,真正被对方化掉的,从历史和现状看,倒是江湖系统。本来,江湖系统里的人们,也很内行地过着自己的江湖生活,不劳庙堂系统里的人们去教化,但他们在与庙堂系统及其中的人们反复互动之后,却不知不觉地欣赏、羡慕起官本位,等级制一类的玩意儿来了,并浸润日深而至于无法自拔。到现在,不是连吃斋念佛的和尚也都有了科级、处级、处级的名分吗?这分明是江湖

# 犟脾气 丑脾气 都是成长记忆



《股市16岁(1991—2006)》  
沪深股市成长的个人观察  
周煊涛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1月出版

□李然忠

这是国内第一部按照编年史体例,“原生态”记录沪深股市16年历史的书。全书有的人物、有细节、有故事;而作者将诗、画、歌融于一炉描摹市场百态、投资心理、民间智慧的股市“16个脾气”,可算是对正史的另类叙述。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绕口令:这个世纪最不可理解的是它竟然能够被理解。作者正是试图“竟然”去理解股市,并且要像理解自己的孩子那样。他的办法是尝试打通人生、社会、财经、文体、自然的通道,以探寻股市红黑相间、阴阳涨跌的奥秘。

闭上眼,想一年股市的关键词是什么?是什么让人刻骨铭心?事实上,沪深股市自创建

起,每年几乎都有一个领涨的主题。本书按年度来写,一年逮一个主题,然后再分八几个特点叙述,等于把16年股市大轮廓勾勒了一下。

说起来,不少令人难忘的书都是用编年史体手法写的。如2005年翻译出版的《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崛起》,如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国内此类写作,首推王安,那本《股爷您上坐》,便在恣意汪洋、狂放潇洒的评说中,翻过一页页历史。

本书的调子要平实的多。在作者眼里,股市16岁,如同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有烦恼更有愉悦。就连那些下跌、那些阴线,也如同一个孩子的委屈。你看2001年6月2245点跌到2005年6月的998点,不就是股市的制度缺陷使然吗?作者写股市16年,似乎是在与孩子对话,也许,这样更便于从人性化角度理解、把握股市,能更加从容,也能从更加接近本质的距离上来认知股市。

本书认定,真正的大牛市是从1996年开始。1996年至1997上半年是第一轮;2000年至2001年上半年是第二轮;2006年开始的是第三轮。顺着大盘的季节图、特别是年线图,股市最大的预测是,今后5年内摸6000点是能实现的梦想,一个16岁的孩子,成长空间不可限量!

股市年年转,有同有不同。同,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升或下跌,赚钱或赔钱,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关

键是看清趋势,踏准节奏,手握牛股,别表错了情,别做反了势,别抱错了股。不同,是一年总有一件或者几件标志性事件。而破题股股权分置改革,终于使股市有了稳健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样才有了2006年前9个月大盘上涨60%多;才有了国庆节后首日大盘突破2001年以来四年的压力线创出新高;才有了中国银行、中国国航、中国工商银行等超级大盘股的上市。

股市说复杂,像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说简单,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本书力图“还原”这种复杂与简单,“还原”股市成长的烦恼和快乐,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这是站在“当下”高度的“还原”,是一种更具宽广视野的“还原”。

书中运用了大量时尚性元素,不仅仅为了好读、好看,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更完整地体现股市发展的广阔社会背景。穿插其间的周杰伦的歌唱、章子怡的电影、姚明的篮球、舒婷、北岛的朦胧诗、齐达内内足球、超女的PK;李泽厚、余秋雨、王蒙、赵鑫珊等名家的学术论著;王安、方泉、水皮、缥缈等人的财经评论等等,有意增加了本书的厚重感;有意经史学者,可以从中找到大量历史细节,众多事件的最初形态;注意社会文化观察家,能从中探寻这些年社会生活、乃至时尚变迁、沿革的脉络。

让人略感不足的是,名为“沪深股市成长的个人观察”,全书个人观察的成分似乎让大量以引述的评论、分析给淹没了。

### 新书过眼

## 《前奏》

毛泽东 1965年重上井冈山

1965年春,72岁的毛泽东从北京南下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是可想而知的。38年后,毛泽东重回故地,到底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本书从毛泽东二上井冈山,在山上所思、所言、所行的历史回放中,探讨那时候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力图从中发现、探讨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这是一部



马礼香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由近百名亲历者和知情者回忆、口述的历史记录。作者历经三个酷暑,自费走访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六县和中央苏区各地,采访了近百名亲历者和知情者。

##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从前在经济低潮中受到绝对冲击的都是蓝领阶层,可谁料如今厄运却降在了专业人士、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身上。一个年薪30万美元的前IT业主管,被裁员后经过两年的失业期,最后去了Gap做销售助理。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发生了许多与此类似的故事。《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芭芭拉·埃伦里奇采用其独特的“体验”方式,亲身探索并记录了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隐秘”王国——白领失业人员的神秘世界,这个一度被大家视为过于舒适、权力过大而不值得关注的社会经济群体今天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突然间要求他们收拾东西走人的通知,使他们一次次地陷入



(美)芭芭拉·埃伦里奇著  
严雨川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财务危机,而这危机的原因并不应该归咎于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对于支撑起美国企业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所谓的美国梦,已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

## 《百年利丰》

从传统商号到现代跨国集团

老字号商行利丰1906年在广州创立,1927年在香港设点,1937年将总部迁往香港,二次大战后重建,1973年上市。100年来,香港的商行一批又一批地更新换代,而利丰始终屹立不倒,度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机时刻。现时业务遍及全球40个国家,于全球聘用逾1.8万名员工,2004年总收入逾70亿美元。利丰的发展历程,实就是20世纪动荡、激变的香港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内地大部分民企经过逾20年的发展,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有部分停滞不前,作者冯邦彦希望,利丰集团百年的发展、壮大、扩张,以及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腾飞发展而多次渡过难关的经历,能



冯邦彦著  
中信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予大批创业和谋求发展的内地企业作为借镜。尤其利丰集团独有的全球物流体系,对国内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极具意义。

## 《中国印度之智慧》(全两册)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1936年去国外之后的著作大都以英文写成,且雅俗共赏,本书当然也是这样,与林语堂一贯的做人、做事和做文章的风格相一致。全书分中国、印度两大卷。原文涉猎了从《道德经》、《尚书》、《庄子》、《论语》到《浮生六记》,从《论语》到《佛经》、《奥义书》、《罗摩衍那》到佛经的中国、印度文化中最精髓和深刻的方面,同时还选取了许多有关这两个古老民族的民族心理、文学想象和日常生活的材料,这又使看起来非常艰涩的国读变得愉快和亲切。在当代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粗糙、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急促的时



林语堂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

候,读这样荡涤胸襟的文字,或许对人生、对自然会有别样感悟,对正在崛起中的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别一种认识。